

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

李 巍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在解释冷战后的国际现实时遭遇了一系列的困境,因此,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一个新趋势。层次回落要求在国际关系学中导入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的回归对于国际关系学寻求进一步的理论突破有着重要而关键的意义。

【关键词】 层次回落;比较政治学;体系理论

【作者简介】 李巍,1981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8)07 - 0052 - 05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大厦的建立,将国内政治从国际关系学中彻底剔除,促成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下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诞生。体系论者认为,国际结构是其核心研究变量,被普遍地运用于对国际现象的解释,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研究路径大有一统江山之势,只不过不同流派所强调的具体国际结构是不同的。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在2007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三篇考察“结构主义”的文章,不仅对国际政治中的结构进行了概念上的正本清源,而且均对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层次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批判,强调相对微观的研究层次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如行为体的策略互动和个体的心理认知等,为超越传统的体系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这三篇文章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笔者在2006年所阐述的“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这一新的理论发展趋势的观点。

但是,研究层次从体系结构层次向其他层次的回落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研究“侵入”到它并不熟悉的、也是曾被其抽象掉的新领地,包括国内政治过程、国家制度结构、利益集团、选区政治和决策者个

人等,从而给国际关系研究者带来新的困难。三位作者并未向读者阐明在“研究层次回落”之后,国际关系学特别是理论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的整体图景。笔者不揣末学新进,尝试对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进行知识上的整合从而实现新的理论突破提出初步看法,以作为对三篇文章的回应与补充。

* 本文写作中得到了陈小鼎、刘丰和左希迎的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约请的三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特此感谢。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的代表作品分别强调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外部约束作用,参见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 - Wesley, 1979;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分别参见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6~17页;尹继武:《结构、认知结构与国际政治心理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18~28页;薛力:《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种系统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29~40页。薛力虽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分析层次,但却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批评。

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

一 体系结构层次的分析及其不足

纵观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史,学科的分化(specialization)与整合(integration)作为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几乎同等重要地推动了人类知识的增长。犹如市场和国家的不同逻辑造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化一样,在政治学内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不同逻辑造成了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分化。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具有共同点:它们都是以若干个国家而不是单个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国家是其学科赖以生存的共同基石。但是它们的研究性质、目的和方法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国家A和国家B,如果不考察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它们之间事实上也不存在以政治关系为核心内容的互动关系,而是对它们本身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异同点及其背后的逻辑进行比较分析,是为比较政治学;如果不考察它们本身的政治特征及其异同,而是着重研究其共性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互动关系,是为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原则是研究对象要具有互动性;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原则是研究对象要具有可比性。因此,它们一个是国际政治学,一个是国内政治学。

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研究路径认为,国家本身的属性差异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有限,从而将国家统一假定为相似的单元,这就形成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巨大分野,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比较政治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意义,加剧了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作为两个分支学科沿着各自不同的研究路径向前延伸,并且造就了两个迥异的学术共同体。

体系论者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观察到了国际整体结构对个体国家的强大约束作用,认为解释国际后果必须或者说至少首先要从国际体系固有的结构出发,其对国际结构的强调和推崇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但是结构最终是由单元构成的,单元是结构的微观基础。而国家又是国际体系结构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单元,单个国家的行为构成了体系中的互动。而国际关系学中,长期缺乏一种关于单元的理论。因此,对体系与单元的区分,使得国际关系学在理论建构上呈现出一种“画地为牢”的特征。

国际关系学的“画地为牢”,将紧密联系着的现实世界分割成多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有利的方面是通过剔除大量无关的事实,抓住最根本的因素,便于理论的建构和精化,从而获得了一种方法论上的优势。目前的三大结构主义理论都是对国际体系进行整体思考而形成的宏观理论,其优点在于对整个体系的宏观走向和重大事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且极为简练。但其不利方面是国际关系学把国家当做不可进一步还原的原子,把对国家内部的研究排除在外,也同时剔除了影响国际关系运动的许多相关事实,从而使理论的解释力和解释范围都大打折扣,尤其表现在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跨国性(注意是transnational而不是international)的新问题时,国际关系的宏观理论出现了集体性的解释失灵。

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新现实对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向彼此借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国家的民主化运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际安全压力的缓解,都使得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和重叠。一方面,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约束着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还强有力地影响它们各自本身内部的政治形态的演化,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层次上升”的趋势,即越来越强调对于所谓的“颠倒的第二意象”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围绕“国际化”或者“全球化”如何塑造了“国内政治”的讨论非常热烈,力图将各种国内问题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759.

阎学通在2007年4月清华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批评笔者的“把比较政治学找回来”的观点时,提出“画地为牢”说,就是基于这种逻辑。

2007年12月,笔者在与阎学通的一次通信中,再次探讨了比较政治学的回归问题。阎学通表示他并不反对国际关系研究借鉴其他学科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但是他强调,其他学科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对国际关系学的渗透必须基于理解国际关系的目的,他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借鉴比较政治学和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是两件事”,并进一步举例说,“我也在学习中国先秦古典文献,目的是为了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而不是介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笔者对此并不持异议。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 - 912.

置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来考察；另一方面，国家本身的政治特点及变化影响了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塑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层次回落”的趋势，即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其代表性理论成果就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论”和现实主义的“新古典派”，强调国际关系研究需要重新将曾经被“抛弃”的国内变量“找回来”。而建立在“双层博弈”的分析思路基础上的“双面外交理论”则成为考察国际与国内的力量互动，连通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进行跨学科整合的最受瞩目的理论成果。

正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现实世界中的彼此交融，要求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世界中拉近距离、相互整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跨越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学的界限，寻求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解释框架便成为了政治学内部一个备受关注的新趋势。

二 比较政治学的导入及其意义

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就发出了“建立一种更好的国内政治理论”的呼吁，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重新给予国内变量以重要地位却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其重要标志是，“国内（domestic）”一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关系著作的标题之中，将国家假定为一元行为体以及对国家进行类似于“台球”或“黑箱”的比喻逐渐走向终结，西方学者纷纷从国内层次寻找国际结果的根源。有的学者探讨了国内政治的缺陷如何导致了国际战争、国际危机和国家的对外战略抉择；也有的学者分析了国内政治制度的特点如何影响了国际谈判结果；还有的学者研究了国内政治运作的不同后果怎样导致了国家在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参与、遵守和选择上的不同。可以说，正是对带来国际后果的国内因素的重新关注，导致了以国内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政治学对国际关系学的全面渗透。

对于国际关系学而言，导入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有助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更加全面地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能够充分解释

国家间的互动模式。但由于结构主义者抽象掉了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巨大差异的事实，从而导致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规律。以华尔兹为代表的体系理论家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进行了区分，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家间的互动所构成的国际结果如何约束国家的行为；对外政策研究的是特定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压力。这种区分为国际关系学无法充分解释国家的

代表性作品是 Robert O.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omas Risse - 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 - 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这两本文集是国际关系学者和比较政治学者共同参与的结晶，反映了两两相互借鉴的趋势。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 - Edge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James A. Caporas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Integrating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4, 1997, pp. 563 - 592.

Robert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International Ambi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War and Reas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ames W. Lanare, ed,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91;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3, 1994, pp. 577 - 592;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Politics and Preventive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1992, pp. 235 - 269; Kenneth A. Schultz, "Domestic Opposition and Signal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4, 1998, pp. 829 - 844;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1, 1998, pp. 289 - 313; Steven E. Lobell, *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eter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 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96, pp. 451 - 478; Jeffrey Checkel,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 - 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4, 1997, pp. 473 - 495.

John Kurt Jacobsen, "Are All Politics Domestic? Perspective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9, No 1, 1996, p. 95.

参见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1 - 72; 但笔者一直反对这种区分，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第 136 ~ 137 页。

对外政策提供了“正当理由”。虽然国际关系学探讨国家间的互动结果,但是国家间的互动结果最终还是被还原到单个国家的行为,因此,不理解单个国家的运动特点特别是大国的对外运动规律,就不可能理解体系的互动模式,因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大国关系,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剥离研究国家对外行为的国际政治理论。否则,国际关系学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结构现实主义的这种“辩护”在事实上并不能自圆其说,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种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能够充分地说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而且,作为体系中的主要构成者的超级大国,它通常能突破国际环境的外部约束,按照国内政治的逻辑决定对外行为。比如,美国在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上,几乎就完全受制于国内政治。在解释超级大国的国际行为时,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方法几乎是失效的。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国内视角对于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必不可缺。而国家的对外政策研究,也成为沟通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最佳桥梁。

除此之外,超级大国本身具备塑造国际结构的能力,这表现为不同的霸权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性质上通常有着很大的差异,进而能改变整体的国际政治运行规律。几乎没有人怀疑,同样都是单极体系,一个苏联称霸的全球体系与一个美国称霸的全球体系肯定会有很多结构上的不同;历史也确实证明,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与20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再比如,当前国际体系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反常就是,制衡美国的国际联盟始终不能出现。虽然均势不能出现,但国际体系却仍然能够维持总体的和平。对此,结构现实主义遭遇了解释困境。西方学者从单元层次寻找原因,将其归因于美国是一个“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y)”。但与其他霸权国相比,美国为何会是一个“仁慈的霸权”?这只能从美国国内的制度设计和文化传统入手,因此对国家单元进行性质和特性上的比较分析就显得极有意义。鉴于此,中国学者一直强调,在国际关系学内部,要加强对那些能影响国际关系议程变化的大国的国内政治的研究。

其次,导入比较政治学有助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国际体系的变化。在国际关系现实

中,国家本身的实力变动能够影响整体结构。换言之,国家的兴衰特别是大国的兴衰,能够对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要探索有关国家为何兴衰的问题,除了要在国家互动的层面寻找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理,如苏联的解体就主要还是来自国内的诱因。国际关系学如果解释不了大国的兴衰,也就解释不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因此,结构现实主义一直被批评为静态的理论,说明不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曾以激烈的言辞批评国际关系学家没能预测到冷战的结束。对于这种批评,国际关系学家不能仅仅用苏联的国内政治不属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畴来搪塞,苏联的解体使国际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导致冷战的和平结束,并带来了国际关系议程的一系列变化。如果对于这种重大的国际现象,主流国际关系学缺少话语权,那么国际关系学的价值就值得怀疑。所以,也正是由于冷战的结束使传统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而激起学界有关研究“层次回落”的强烈要求。而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能方便国际关系研究者观察在国际体系这个“大棋盘”中扮演“棋手”角色的主要国家的兴衰沉浮,从而对国际结构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做出更加精准的预测。同时,对国际现实结构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姜亚译:《比较政治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David A. Lake, "British and American Hegemony Compared: Lessons for the Current Era of Decline," in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s and Wealt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7 - 13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1999, p. 38.

亨廷顿在文中分析“仁慈的霸权”这种观点时对其提出了批评。“仁慈的霸权”说在学理上究竟是否成立,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印证了国际关系学界更加注重研究单元属性的这一学术发展趋势。

代表人物是王缉思,他多次强调要对影响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国内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笔者的学术研究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1992/1993, pp. 5 - 58. 其他批评参见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1994, pp. 108 - 148.

的描述也更为全面。

最后,导入比较政治学有助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发掘影响国际关系运动的社会性因素。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将国家假定为一元的行为体,这一假定暗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即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与社会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国家统治社会,社会本身不具备国际关系的意义,因此一直被排除在理论建构之外。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转移,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不再仅仅是政府间关系,更多的是社会间关系,社会性因素在影响国家间互动方面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在比较政治学中,国家与社会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其探讨的核心内容。比较政治学的导入,能够使社会性因素重新回到国际关系之中,使除了国家之外的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也能得到承认,从而拓展和丰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

在国际关系学中导入比较政治学,其目的是将被结构主义者“扔掉”的国内政治过程“重新找回来”,将比较政治学中已有的关于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阶级、个人等更加微观层次的理论成果纳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来,以作为对宏观层次理论路径的补充。但除此之外,比较政治学所强调的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归纳不同国家的国际行为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当初,结构主义者之所以对国内政治进行有意识的“忽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要想对多样化的国内政治进行理论化操作,并进而整合到体系理论的框架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是借用比较分析的手段,对不同的国家单元依据属性进行分类,然后观察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行为模式,能够总结出基本的规律。比如,民主和平论就将国家区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家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带来了不同的互动模式。比较分析方法是观察单元属性所带来的国际后果的重要手段。

三 结束语

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处于一个相对的沉寂期,没有产生高度的学术兴奋点,学者

大都分散在各自感兴趣的议题领域内精耕细作,一般理论的进展殊为有限。对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被明确地“锁定”在体系层次,刻意与国内政治进行严格的切割,束缚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视野,从而导致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逐渐走向自我封闭和自我僵化。

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是对传统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所存在的固有缺陷的反思,它意味着比较政治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全面回归。导入比较政治学,恢复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有地位,借用对不同单元的比较分析方法,也许是突破国际关系研究现有困局的一种选择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而且,目前绝大多数单元层次的分析视角,并非是要回到华尔兹所曾经批评过的“还原主义”的老路上,而是试图将单元层次的因素整合到体系理论之中,为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跨层次分析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层次的回落”是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超越,而非抛弃。但是,这种跨层次的分析大都还停留在对国际具体事件的案例分析阶段,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既简约又解释力强的一般性理论。“层次的回落”目前只是带来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的“理论危机”,它们还没有对结构主义在总体上形成替代之势。

在中国,由于政治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内部次级学科划分不够精确,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逻辑,进一步进行次级学科的科学划分;另一方面,又要根据解释现实的需要,跨越学科的界限,进行知识的有效整合。

[收稿日期:2007-11-12]

[修回日期:2008-05-08]

[责任编辑:谭秀英]

宋国友对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国家而无视社会的偏见提出了比较彻底的批评,参见宋国友:《平衡社会利益与国家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Fred Hallida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4, pp. 60-61.

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第139页。

Ethan B. Kapstein, "Is Realism Dead?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4, 1995, p. 752.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and National Mobilization: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urvey

Shi Yinhong Chen Xiao (32)

"National mobilization" is a politico-strategic concept broader than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Modern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drastically expanded the exten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ways of mobilization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the mobilizing capability. In general,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national mobilization was intimately related with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system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stages, i.e., the early, mid, and late modern times, with their respective remarkable features and with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as the primary dynamism or theme of the process. The three typical late modern political systems, namely,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had markedly different practices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demonstrating their respective conducts and capabilities of mobilization.

IR Theories in Africa: Dilemma,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Lang Yijian Li Xinggang (40)

The African history in the past 100 years is not only a complicated history of resisting the colonialism, neo-colon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but also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characterized by breaking, restructuri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domina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the Africans have been trying to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and search for the way out. However,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Africa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make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actice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Africa's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dilemma,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IR studies in Africa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self-understanding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self-realization. Now, Africa is making hard efforts to search its way out.

Levels of Analysis in IR: Rise and Fall

Chen Xiaoding (48)

Levels of Analysis have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IR studies. Currently, the structuralism is coming to a bottleneck while other levels of analysis such as process and unit analysis gradually gained impetu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leve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genda. By comparing the rises and falls of the levels in histo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levels of analysis are complementary and applies to different theories, and proposes to encourage the consciousness in identifying the level of analysis.

Bridging the Gap: the Retur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Li Wei (52)

There is a pronounced gap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Given the incompleteness of structuralism on system level of analysis in IR studies, it rarely provides knowledge that is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actions of the component uni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ethodologies and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breakthrough of IR theories. Therefore, the retur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IR.